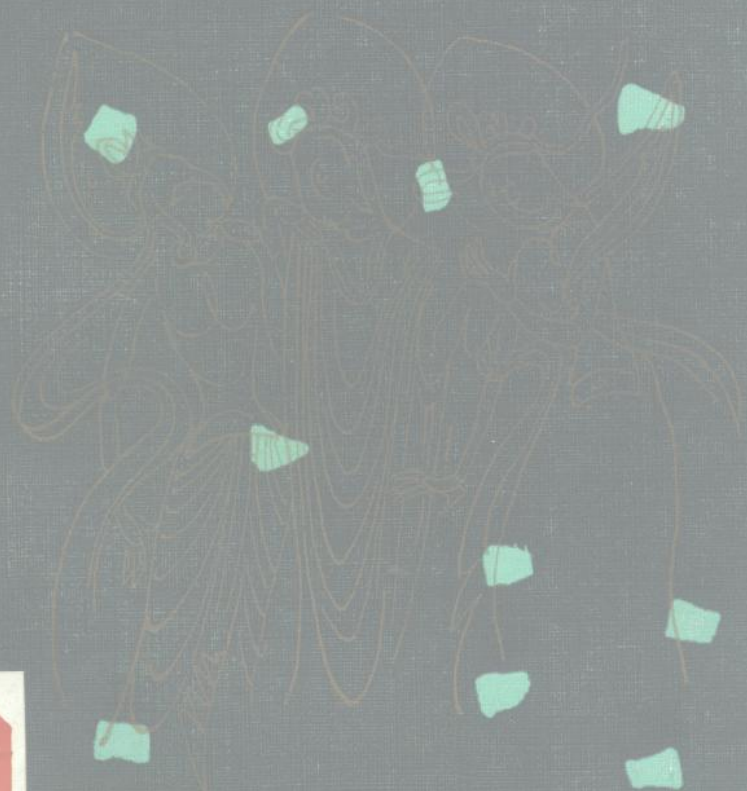


敦煌学论集



32083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学论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敦煌学论集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13,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
书号：8096·1062 定价：1.75元

内 容 提 要

敦煌——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敦煌学——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我国是敦煌学的故乡，也是开展敦煌学研究最早的国家，几十年来涌现出许多敦煌学家和优秀的研究著作。本书选编了一些敦煌学家近年来撰写的研究文章，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第二部分专门对敦煌文学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利用敦煌文献进行语言学和其它学科的研究。所选论文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一读。

目 录

- 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陈人之(1)
- 敦煌遗书杂记四篇……………刘铭恕(45)
- 补敦煌曲子词……………周绍良(68)
- 《补全唐诗》校记……………蒋礼鸿(73)
- 《庐山远公话》补校……………项 楚(81)
- 俗讲仪式考……………王文才(100)
- 对《双恩记》讲经文的一些推断……………白化文
程毅中(112)
- 敦煌话本《叶净能诗》考辨……………张鸿勋(130)
- 敦煌变文艺术散论……………张锡厚(145)
-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柴剑虹(171)
- 论敦煌民间变文……………高国藩(185)
- 讲唱文学的尝试和先导
——敦煌俗赋的产生及衍变……………何国栋(203)

敦煌古《脉经》残卷考略·····	周笃文(212)
“标音系”的古书与变文中假借字的 解读·····	宁希元(235)
敦煌词校勘中所见的形误、音误字简 编·····	孙其芳(250)
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音韵 类(导言)·····	张金泉(268)
敦煌俗文学熟语初探·····	江蓝生(280)
编后记·····	(293)

八十年来我国之 敦煌学

陈人之

引 言

二十世纪初叶，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角，发生了一件震动国际学术界的大事。这件大事，就是1900年（清光绪26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打开了。在洞内沉睡了将近九百年的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和木刻书籍在人间重新露面。这些写本书籍涉及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千多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一些帝国主义分子闻风而来，把大部分敦煌文献盗劫而去。各国学者也各就其治学范围，对这批古代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成绩斐然可观，学术界因名之曰“敦煌学”。1931年，我国著名学者、国际上有名的敦煌学家陈寅恪述其事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我国学

者，在1902年开始接触这些资料，从1909年就正式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1924年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人士组织“敦煌经籍保存会”，阻止敦煌珍品的继续外流并从事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1934年，北京图书馆派专人到英法两京调查被劫敦煌文献的情况。1943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国解放以后，又于1951年将该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展敦煌文物文献的保管、整理、临摹和研究工作，前后持续近四十年之久。近年以来，随着我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敦煌学又成为国际东方学的热门学科。世界上一些国家出现了敦煌学的学术研究组织，整理出版了部分敦煌秘籍写本，发表了一批敦煌学的学术论著，召开了国际敦煌学术会议。1982年春节甫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又召集在京著名的专家、学者李一氓、季羨林、尹达、常书鸿、翁独健等六十余人，座谈如何搞好敦煌、吐鲁番文物文献的研究工作。接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又决定将敦煌文物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纳入国家古籍整理规划之中，并成立了敦煌遗书选辑小组，由各方面专家张政烺、何兹全、周祖谟、王永兴、周绍良、宁可、沙知、宋家钰、马雍等组成，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将遗书中的汉文部分分类分卷影印出版，预计将出版三十卷。专家们还提出，要迅速组织力量搞出一套敦煌文物、文献总目，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并且建议成立有关敦煌学的学术研究组织，建立相应的研究中心，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学术讨论会。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必将出现新的气象，取得新的成果。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及敦煌 文物文献的学术价值

敦煌学在世界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历八十年不衰。但对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迄今却未统一，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只应该是敦煌文献，即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第二种意见认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敦煌遗书，也包括敦煌的石窟艺术，如壁画、塑像以及其它文物。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范围还应该更广泛一些，不仅包括在敦煌发现的文物文献，还要包括在新疆吐鲁番一带发现的文物文献。第一种意见在敦煌学研究的初期阶段，由于交通不便，国内国外的学者，只能看到敦煌遗书，对大量难以移动的敦煌壁画、塑像等艺术品不能亲眼看到，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交通发达，而且有彩色摄影等方便的条件，这种意见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从各国研究工作者的实践来看，按第二种意见办的居多数。伯希和盗劫大批敦煌资料回巴黎后，既编写敦煌文献目录，也编辑整理出版了《敦煌图录》六大册。在三十年代左右，世界敦煌学者，既研究敦煌文献，也研究敦煌艺术。前者著作甚多，后者如日本松本荣一于昭和十二年（公元1937年）出版的《敦煌画之研究》，就是一例。七十年代在巴黎成立的“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织”，其整理研究对象，就包括有关敦煌的遗书和美术品在内。近年以来，国际上的敦煌学家明确提出，研究敦煌学，光看写本不成，还要看壁画和塑像，要把写本研究与壁画、塑像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新的成果。举个例子来说，在吐蕃统治陇右河西的

时候，沙州张义潮组织归义军起义，使陇右河西十一州复归李唐版图，这在唐五代西北史上是一件大事，而新旧唐书均未为张义潮立传，其它正史记载的也很少。但是在敦煌文献文物中，关于归义军张家及其继承者曹家的资料，直接有关的在一百种以上。罗振玉早期根据部分敦煌资料及其它史料，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与《瓜沙曹氏年表》，王重民写了《金山国坠事拾零》，补正史之缺漏。以后向达、姜亮夫阅读了敦煌遗书中关于张义潮的其它材料及莫高窟题名，又从敦煌壁画《张义潮出行图》上，看到唐代诸道行军的仪卫制度和多民族杂居的河西地区军旅特点，向达撰写了《罗淑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姜亮夫撰写了《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台湾学者苏莹辉撰写了《张义潮》、《补唐书张淮深传》、《曹元忠卒年考》、《瓜沙史事系年》等著作。近年贺世哲、孙修身又根据洞窟提供的资料撰写了《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使张、曹两家的资料更为系统、完整。又如壁画中的佛经故事很多，如果把变文和变相（即有关佛经故事的壁画）结合起来研究，也会得到新的成果。因为尽管敦煌壁画中的佛经故事较多，有它的局限性，但它与现实生活仍然有密切的关系，举凡中世纪各阶级、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民族、建筑、中西交往、封建官僚制度、衣冠服饰演变以及劳动人民的各种生活，都有反映。可以说，它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形象的历史，是一座珍贵的历史宝库。把敦煌遗书与敦煌壁画、塑像及其它文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一切可信资料，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是不会把重要资料丢弃不管的。现在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虽然研究人员不多，但它也不只是研究“文”，也研究“物”，既研究敦煌遗书，也研究敦煌艺术。全所分为历史、考古、遗书、美术、保护等五个研

究室，其研究对象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至于第三种意见，主张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要包括吐鲁番文物文献在内，是因为在本世纪初，国外的一些所谓“探险家”，在我国敦煌、吐鲁番等地盗去大量文物文献，合称之为“西域文献”。所谓“斯坦因文书”、“大谷文书”等，都包括敦煌、吐鲁番的文物、文献在内。而且吐鲁番出土的文书里，就有来自敦煌、庭州、洛州等地的文书，内容也多有关。他们为了研究方便起见，所以主张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吐鲁番文书。西方的“国际西域文献会议”，就简称“敦煌学会”。在国际上，主要是日、法等国，有将敦煌学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的。他们所谓的“广义”敦煌学，即指研究整个西域文献而言；所谓的“狭义”敦煌学，即指专门研究敦煌文物文献而言。不过他们越来越觉得“广义”敦煌学不能自圆其说，实践中遇到很多麻烦，所以渐渐地只主张“狭义”的敦煌学了（见日本神田喜一郎所著《敦煌学五十年》）。我们认为，敦煌学是以地方命名的一门学科，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内容，如果在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中又加入吐鲁番文书，是与敦煌学以地方命名的意义不相容的。在学术研究上，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书或其它西域文献有密切的关系，可以互为参考，互为补充。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还是以敦煌地区出土的文物文献为宜。敦煌文物文献主要是从石窟里面发现的，是古人有意封存藏下来的。吐鲁番文物文献，主要是从古墓里面发现的，是当地古人有以纸为死者服饰乃至葬具的习俗而保存下来的。这些文物文献从两个地方发现，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这二者可以各自称为“敦煌学”、“吐鲁番学”，也可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但敦煌学不能包括吐鲁番学。我们不能盲目按照外人的意见办事。我们应自己走自己的路，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合理的意见

来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仅以古代文献的发现来说，最重要的就有公元前150年左右西汉景帝年间孔壁古文的发现，公元270年左右西晋武帝年间汲冢竹书的发现，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叶，又有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莫高窟遗书、吐鲁番文书的发现。解放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地开展以及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又多次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和古籍，其中最重要的古籍发现，要算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了。但是，最受国内国外学术界重视的还是要算敦煌遗书的发现。因为敦煌遗书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富，价值之高，我国历史上古籍的多次重要发现，均不能与之相比。

第一，数量最多。敦煌遗书，不是象历史上几次发现一样，只有几部书、十几部书或十几万字，而仅仅是写本部分，就有四、五万件。此外，还有寺院的契约、帐簿、户籍、信札、医卜、历本、状牒、祭文和画有佛像的绢、织物、绣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一千余件。这样巨大数量的古文献文物的发现，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是我国年代最古的纸写本和刻印本书籍。从魏、晋到隋、唐，是我国书籍制度从简册发展到卷轴的时期，也是印本书籍的首创时期。清代道光年间，曾做过刽子手曾国藩幕客的莫友芝，偶然得到一件唐人写本《说文解字》的“木部”残叶，就视为惊人秘籍，并根据这件残叶写成《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一书。当时，有人赋诗咏其事曰：“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人何曾见唐本”。这在当时是纪实的。可是数十年之后，敦煌写本出世，不要说唐人写本，连比它时代古得多的晋、六朝的写本都

有了。最长的敦煌卷子有长到三、四丈的，一般的也在一、二丈之间。写本的形式，多数是卷子，少数是蝶装小册，还有木刻刊印本几十种。许多写本还注明了抄写年月，最早的敦煌写本，一说在北魏太安四年（公元458年），一说为西凉建初六年（公元410年），一说为东晋年间（公元317年—420年）。另据日本大谷光瑞于1958年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上卷附表所载，最早的写本是在西晋咸宁年间（公元275—280年）。最迟的也是北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莫友芝得到的唐人写本残叶与之相比，真是微不足道。这些写本卷子，不仅使我们找到了我国古代在造纸和印刷方面的实物标本，而且使我们了解到我国卷轴的制度、形式、书写规格、使用材料、装饰方法、防蛀科学以及当时民间的文化面貌。这对后来的印本书籍有深远的影响。敦煌所出六朝写本，纸质洁白坚韧，可见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水平很高。唐代有了雕板印刷，加快了书籍的流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敦煌遗书中有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刻本《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有日期的印刷物。这本书不仅有文字，而且卷头有佛说法图一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画。这个刻本刀法纯熟，线条精细有力，印刷精良，可以看出刻版、印刷的技术都是很高的。

第三，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敦煌遗书内容十分广泛，有人喻之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四、五万卷写本，主要部分是佛经、道经、摩尼经、景教经，但是儒家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通俗文学等也都有相当数量。同时，还有一些户籍、帐簿、医卜、历本、契据、信札等等。在文字方面，则有汉文、梵文、藏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突厥文。古代主要的西域语文资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第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敦煌文献由于保存的年代较古，未经转抄，脱落错误较少，在校勘学上，有很大的用处。特别是其中有许多失传已久的为人们所不知道的写本重新发现，不仅增加了我国古代典籍的内容，而且学术上的很多问题可以据以判定。所以无论从校勘学上或学术思想上说，这些古籍都是十分宝贵的。加上它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绝好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内地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关系的重要材料。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很广，不可能一一说到。现仅将敦煌文献文物几个重要方面，略述如下：

1. 关于佛教经典

敦煌文献中，以佛教经典为最多，总数约占全部卷子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因此，从数量上说，敦煌遗书也可以称之为“佛教遗书”。举凡佛教各宗的书，如经、律、论三藏典籍都有。在这些经典中，有许多是早已失传、为世人所不知道的藏外古佚佛经。据八十年来中外学者的考证，已知敦煌佛经中的藏外古佚佛经有368种之多，其中有的经典，在印度和我国都早已失传，如《大乘入道次第》、《大乘四法经论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芋经随听手镜记》、《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随罗尼经》以及《萨婆多宗五事论》等等，不胜枚举。这批古佚佛经，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例如禅宗一系的发展变化很大。开始是北宗得势，以后逐渐转向南宗。南宗最初是神会一系得势，以后又逐渐转到南岳、青原二系。在这些转变过程中，失势各系的资料，由于不受重视，大多丧失。而在敦煌卷子中，却保存下来不少。比如在敦煌卷子中，托名禅宗创始人达摩的著作就有十几种。达摩的首传弟子慧可，才能非凡，聚徒讲学，“言满天下”，敦煌卷子中的《四行论》长卷，就是后人根据他创作的歌谣小品

编纂而成的。慧可传僧粲，僧粲传道信、弘忍。敦煌卷子中的《传法宝记》就是道信的传记，《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即为弘忍的著作。弘忍的弟子，四川智詵的门下作《历代传法宝记》，玄奘作《楞伽人物志》，玄奘门下净觉又根据《楞伽人物志》撰写《楞伽师资记》等，都是长期失佚以后，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至于禅宗内部分裂为南北两宗以后，各宗的著作，在敦煌卷子中也发现不少。如北宗的创始人神秀的著作《大乘无生方便门》、《大乘五方便》，南宗创始人慧能的《坛经》以及为南宗禅奠定基础的七祖神会的说法记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等，都在敦煌卷子中发现了。这对于研究禅宗的发展史，价值极大。其它如记载我国佛教史迹，各地佛教情况，吐蕃统治沙洲时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规矩等卷子，也为数不少。要研究我国佛教史，是离不开这些材料的。

2. 关于道家与其它宗教经典

敦煌写本为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共六百年左右的写本。这一时期，正是我国佛教、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敦煌写本，除佛经以外，由于唐、宋两代均崇奉老聃，因而道家典籍，为数也不少。据统计，敦煌道教典籍在六十种以上。除老子《道德经》以外，还有演绎性质的小说。关于老子《道德经》的抄本和注疏，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所载，就有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老子义》、成玄英撰《老子道德经义疏》、李荣撰《老子道德经注》、唐明皇撰《道德真经疏》、郭象注《南华真经》等十余种。这些写本，多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这与今本道德经上下二卷不同。然而在七十年代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和马王堆帛书《老子》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前的写本，比敦煌写

本早八九百年，均是德经上，道经下。可见《老子》以“德”、“道”分上下是战国以来的旧传。敦煌写本保持了这个真面目，而且其文字的多寡同异，敦煌几个写本互不相同，与今本和唐人所传《道德经幢》也不相同，是研究《老子》的绝好材料。至于《老子》注本，如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经义疏》，为后世失传的佳本，保存了许多古代的见解，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又如伯2256卷述《道教》源流，伯3277卷以儒家之说解道家之言，在学术史上也很有价值。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在敦煌写本中，凡是《道德经》及其它道家经典，卷子用纸的质量，书法的工整，品式的考究，都在其它一切写本之上。这也可以看出我国在唐、宋两代，道教的地位在较长时间中是在儒家及其它各派学说之上的。

在敦煌遗书里面，其它宗教的材料，则有景教和摩尼教。景教是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我国以后，流行凡二百多年，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但景教古经传世的极少，文献上的记载也不多。在敦煌卷子里面，则保存有景教资料：《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宣元始本经》、《序听迷诗所经》以及景教画像一幅，其中《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后还附景教经目三十种。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唐代景教在我国流行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珍贵资料。

摩尼教为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所创。该教以波斯拜火教为基础，参酌基督教、佛教教义而自成一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一带，为中世纪时亚洲大宗教之一，对人类文明及传递东西文化有较大的贡献，对回鹘在政治上、文化上有特殊影响。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摩尼教经新疆传至我国，先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以后又在江陵、江都、南昌、绍兴、太原等地

建寺，可见当时流行之盛。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即摩尼教传入中国150余年以后，摩尼教被禁，寺院被废，教徒处死，经典荡然无存。现敦煌卷子中发现《摩尼教经》三卷，分藏北京、巴黎和伦敦，成为研究摩尼教非常稀有的材料。

3. 关于儒家经典

敦煌卷子中，儒家典籍亦复不少，总数约在百卷以上。儒家所称“五经”中之《诗》、《书》、《易》、《礼》、《春秋》以及《论语》等的古写本，均有发现。在这些古写本中，以《尚书》、《诗经》和《论语》最为重要。

《尚书》是商、周奴隶社会时期的重要文告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在儒家“五经”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但由于它文字艰涩，错落较多，历代改动伪造的又不少，因此，也是争论最多的一部经典。自唐玄宗命集贤学士卫包将《尚书》古文改为今文以后，古文《尚书》遂长期失传，宋版《尚书》即为稀世之宝。但敦煌《尚书》写本，均为六朝、初唐时的“隶古定”写本，重要的有夏书七篇、商书七篇、周书顾命等，均为绝迹千年、未经天宝改动的古本，是魏晋以来相传的原本，保存了《尚书》原来的面目，据此可以判定宋本以来的真伪错落，各家注疏的许多分歧也可由此得到解决。

敦煌所出《诗经》各写本，以郑玄注《毛诗古训传》和《毛诗音》为最多。巴黎、伦敦所藏即达二十卷以上，均系六朝和唐人写本，与今本不同之处甚多，其中一、二字之差，与原意完全不同。清代许多学者，费极大的力气以更定一字而不可得，有此敦煌写本，许多疑义就迎刃而解。比如敦煌写本晋徐邈撰《毛诗音》残卷仅存九十八行，而所存音义即近千条，这在《诗经》研